

国内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1995- 2006

江 沛 迟晓静

十年来,伴随着抗日战争史学界研究范式的转变,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日益受到重视,对社会史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不仅赋予了众多相关资料新的生命,大大开阔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视野,也使战时社会史颇受注目。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研究,在新作不断、创新繁荣的同时,也推动着已往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战时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经济史等领域的推陈出新,促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极大地开阔了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有力地提升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20世纪90年中期以来,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强,有关抗战史的大量中外历史资料陆续被公布或发掘出来,特别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使得一些大型资料集的编辑者,开始特别关注有关社会史的相关史料,从而推进了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开展。在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资料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辑第3编中,都采用了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日伪政权等分类,收集了大量有关的档案、文献、报刊、文史资料、回忆录以及部分日文资料,虽然并无明确分类的社会史部分,但相当一部分有关抗战社会史的资料,散见于各册中,利用价值较高。刘明逵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把近代百余年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状况,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土

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5 个时期, 其中第 10- 12 册涉及抗战时期国统区、敌后根据地、沦陷区的工人运动。四川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共同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主要编辑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有关管制物价的政策法令, 各部各省市政府有关管制物价实施方案及执行情况报告, 同时还编选了国民政府统计部门编制的国统区各重要城市物价指数表、运价指数表、各重要市县生活费指数表等, 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战时国统区的物价状况。由中央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的日本侵华史资料丛书, 共分《日伪的清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华北大“扫荡”》(中华书局 1997 年版)、《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 1998 年版)、《华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等分卷, 收集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档案与文献资料, 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各地日伪政权的政权统治、经济掠夺、军事“扫荡”、思想文化奴化等方面的活动, 许多资料与沦陷区的社会史有关。上海市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揭露了日军在沪屠杀人民、轰炸城市、奸淫妇女、贩卖毒品、抢掠财物等内容。该档案馆编辑的《日本华中经济掠夺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版) 一书, 汇编了该馆所藏相关档案, 特别是大量选取具有“自供状”性质的日伪档案, 按历史时段和区域类型汇编, 为战时日本对华经济侵略、金融破坏及近代中国经济史等专项研究, 提供了丰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资料, 对于日本军部与政府在 1933 年至 1945 年间在华北、华东区域强掳役使劳工的政策、决策与执行机关的有关文

献、华工劳工掠夺计划及实施情况的统计、掠夺劳工的主要手段、渠道及虐待劳工的情况均有所披露,基本理清了抗战期间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劳工整个决策、执行过程,特别是在日本掠夺输出和役使华北强制劳工人数,华北劳工协会性质与幕后决策系统,日本向蒙疆、朝鲜输出使用华北强制劳工情形,华北塘沽劳工收容所、青岛劳工训练所内幕等问题的史料发掘上有所突破。青岛市档案馆编著的《铁蹄下的罪恶——日本在青岛掠劳工始末》(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 年版),披露了大量日本掠夺强制劳工的档案,对日本在青岛掠夺劳工的历史及详情作了系统梳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以大事记的形式,分门别类地将抗战时期发生在各地的日军暴行予以记载,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资料。由南京大学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2007 年版),目前已出版 55 卷,这部尽可能汇集海内外相关资料的史料集,全面展现大屠杀的实态及对南京社会的巨大破坏和对南京民众及中国人心理上造成了严重创伤,为提升“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学术水准奠定了坚实基础。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为总主编的 10 卷本《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是一部大型的档案文献资料工具书,也是近年来日本侵华罪行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向世人又提供了一份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

以上档案资料的编辑与出版,是近年来抗日战争社会史研究深化的基础,也体现了史学界学术理念的重大转变,许多在过去被认为并无重大价值的社会史史料,开始出现在各类史料书中并为学者所广泛引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研究的持续深入,可谓功德无量。

近年来,有关抗战史研究的会议较多,内容多涉及到抗战时期

社会史,但以抗战社会史为专题的会议较少。1999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大会主要介绍了日军细菌战的调查情况。同年,“日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公民研讨会”在日本召开,学者们针对日本的战争罪责、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日遗化学武器、劳工、性暴力、掠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000年3月,在上海首次召开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犯罪为主要内容,分“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等暴力及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和赔偿专题。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对战时中国人口损失、人口迁移及战时人口重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及状况 1937—194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6月在哈佛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探讨了战时国、共、日、伪四方在各地政权的运作状况。2005年6月,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在山西省会太原市举办了“抗日根据地与太行精神”学术研讨会,近50篇的会议论文的论题涵盖了根据地政权与经济建设、社会变迁、军事斗争、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方面。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青岛大学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研讨会”,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和伦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在南京共同主办“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动国际研讨会”先后举行。2005年12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虽然这些会议的主题并不是战时社会史,但与会的一些论文也涉及了抗战时期社会史的重要问题。

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侧重于对社会结构(基层权力、社团、宗

族、家庭等)、社会阶层、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丧、祭祀、娱乐、民俗等)、社会问题与冲突(族群矛盾、人口与游民、秘密结社与土匪、娼赌毒、官民冲突等)、社会救济、社会心理(宗教崇拜、民间信仰、心态等)诸方面的考察,抗战时期社会史的研究还应包括战时经济、战时动员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据对 1995-2006 年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收录论文的不完全统计(截止 2007 年 1 月 10 日检索),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 8745 余篇(以“抗日战争”为篇名和关键词检索所得 1964 篇。),其中有关社会史范畴的论文约占 1/6。通过对唯一的专业性杂志《抗日战争研究》10 年来发表的 903 篇论文(2007 年 1 月 10 日检索)的分析可知,研究战时社会史的论文不足 80 篇,约占总数的 9%。社会问题方面的论文较多,主要讨论慰安妇问题(11 篇)和强制华工问题(8 篇),其它方面涉及较少。尽管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但有关抗战社会史的论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研究范围也在逐步扩大:

1995-2006 年《抗日战争研究》

发表涉及战时社会史内容论文分类统计表

类 别	数 量	类 别	数 量
区域社会变动	5	社会救济	4
社会结构(基层权力、社团、宗族、家庭)	3	社会动员	2
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丧、祭祀、娱乐、民俗)	5	社会问题(族群矛盾、人口与游民、结社、兵匪、娼赌毒)	40
社会经济(工农业及贸易、交通、城乡关系)	11	综述及书评	4
社会心理	2	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1

十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史的专著有 20 余种,内容涉

及社会变动、人口流动、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婚姻家庭等方面，将在下边相关部分予以介绍。

有关抗日战争社会史的研究，一些学术综述论文已有涉及^①，极有价值，但总结时间较早，相关论述篇幅过小，侧重点不一，涵盖面有限。本文试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的众多成果进行综合性的评述，一些海外学者著作的中译本也尽力罗列，希望有助于海内外学者了解学术信息，掌握学术动态，对抗战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当之处，恳望教正。

一 区域结构变动广受重视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因政权统治不同形成了国统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三大区域，这是战时行政管理体制发生的重大变化，也直接影响着三大区域社会结构的变化。

由于此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主持了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的汇编工作，出版了所有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资料选编，为近年来战时各根据地区域社会变迁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最多。魏宏运所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②一书，汇编了其20年间有关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成果，内容涉及战时晋察冀边区社会变动、战时人口迁移、高校西迁，战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货币统一、集市贸易等方面，新意颇多。此外，魏宏运从冀东、太行山地区、祁建民从晋察绥地区切入，以整体性区域研究的视角，对抗战前后三个区域社会形态的变动

① 李金铮、张雪：《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与延续、华北敌后抗战政权、日伪政权的统治及对战时社会变迁的影响,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魏宏运于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对冀东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并将所得口述资料与20世纪前期日本“满铁”的调查资料进行了极有意义的对比,认为在抗战时期不同性质政权并存和更替的背景下,多变的战争环境对冀东农村社会的影响错综复杂,经济难以步入常规,政权更替导致行政失控,社会习俗延续依旧。^①在对同一时期太行山地区社会变动的研究中,魏宏运等人对太行山区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农业发展、农村金融借贷网络、商业和集市贸易、工矿业的兴盛和发展、村落家庭和家族变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分析,由此考察了抗日战争与太行山区社会变动的基本关系。^②魏宏运和祁建民还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抗日战争对不同区域社会变迁的强制性作用。^③

江沛将战时社会变动的特征概括为战时中国行政区域一分为三、中国社会重心西移,抗战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力求从宏观上总结战时中国社会变动的基本性质。^④他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中共领导的华北根据地因战争引起的巨变,认为华北各根据地是中共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验场,其社会变革不仅与战时国统区政治变革迟滞、工业近代化迅速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走向,他同时指出,

① 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 魏宏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社会调查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祁建民:《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④ 江沛:《全面抗战与中国社会变动特征述论》,《历史教学》2005年第9期。

各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经济变迁缺乏“经济内在机制的驱动”。^①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江沛又分析了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后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华北农村，其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如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的宗族形态、趋于小型的家庭范式、剧烈变动的农村阶层、广泛兴起的农民结社等，都是这一时期社会变动的特征，由此说明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无力与僵死，体现了农民对于社会变动的适应与抗争，为了一场新的社会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②

方明东从农村社区区划和社区结构变动两方面，考察了中国革命对农村社区变革的影响，归纳了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变动变革的特点，认为革命对农村自然社区分布并无多大触动，但法定社区的变革较大。革命根本改变了各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③ 李柏林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对土地关系、阶级结构和乡村社会生活等方面影响的考察，试图反映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特征。^④ 史志宏以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为例，分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用关系，以及农村各阶层除土地之外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⑤

① 江沛：《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② 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南开学报》1998年第4期。

③ 方明东：《革命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变革》，《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④ 李柏林：《减租减息与淮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的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⑤ 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用关系——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20世纪30、40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以外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李智勇在对陕甘宁边区政治形态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强调了中共地方政权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社会结构、移民、习俗及铲除娼、毒、赌等社会问题上的重要作用。^①黄正林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市场贸易、乡村社会改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②渠桂萍、王先明分析了1941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举行的民主“村选”,认为中共藉此重构各地基层政权,促成基层权力结构的转变,新的乡村政权成为抗日民主政府与基层社会上下沟通的“桥梁”,进而获取民众的支持、达到了控制社会资源的目的。^③温锐对战时政治如何渗透边区农村并产生影响的过程及方式进行了细致考察。^④1996年5月,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召开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政治动员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李向前、纪保宁(Pauline Keating)、雷颐、魏宏运、温锐、田西如、秦富平、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冯崇义、艾丽丝·戴维多(Elise De Vido)、班国瑞(Gregor Benton)等的论文,分别从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和山东根据地的党政组织、经济改革与社会动员、基层政权变化、革命与宗教关系的角度,考察了西北、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生的社会变迁,在把握战时特殊环境的同时,着意探讨各根据地的发生、发展与各区域社会结构变动的关系,特别强调了现代中国政治与区域

-
- ①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 ②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3期;《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 ③ 渠桂萍、王先明:《试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动(1937-1945)》,《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1期。
- ④ 温锐:《战时政治对晋察冀边区农村社区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社会结构变动间的特殊联系。^①

相形之下，由于已有学术研究积累的限制等原因，20世纪90年中前期，学界对于战时国统区社会结构关注不够。近年来，有关战时国统区社会变迁的研究，开始得到逐步加强。侯德础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及周边地区的经济与文教》一书，涉及到了诸如战时大后方工业的开发、四川的田赋征实、巴蜀战时交通、战时国统区的高考招生制度、大后方的职业教育、“工合”运动及川康等省的禁毒运动等内容。^②

在对沦陷区的区域性考察中，由于黄美真、蔡德金等先生对汪伪政权诸多资料的编辑及论述，形成了汪伪政权研究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有关汪伪政权时期华中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进展。刘志英从众多档案、报刊资料出发，系统研究了沦陷时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的管理，认为汪伪政权这一管理政策，宏观而论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值得肯定的经验和结果。^③潘敏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④，通过个案的研究将分析的触角深入至沦陷区的社会实态中，颇有新意。她在考察了江苏县镇的22个“维持会”后指出，维持会上层人物基本都是地方头面人物，或是有势力、有影响力之人，但他们进入维持会动机复杂。维持会内中日矛盾迭起，中方显然的弱势地位迫使一些人只能采取退避的方式消极抵抗。一些地方的维持会几经易人，维持秩序的职能越来越弱，甚至成为社会的乱源。^⑤

① 冯崇义、古德曼：《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刘志英：《沦陷时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

⑤ 潘敏：《日伪时期江苏县镇“维持会”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李峻着重论述了日伪统治上海时的社会实态, 强调日本非常重视上海的战略地位, 积极的扩张经济、政治势力, 加强对上海社会的控制, 作者认为, 日伪政权在上海的实际统治区域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市, 控制程度不断强化, 统治手段不断翻新。在日伪殖民统治下, 上海民众的社会心态发生了重大转变。^① 魏宏运以上海沦陷后的“孤岛”社会实态为视角, 考察日本当局在上海沦陷区实行的全方位、封闭式管理, 民众生活极度困难, 反日斗争此起彼伏。^②

在战时华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 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③, 以大量档案资料为基础, 对日军及伪政权在华北的经济统制政策及实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他们的工作是研究沦陷时期华北区域社会变动的重要前提。江沛以 1941—1942 年间日伪政权在华北发动的“治安强化运动”为分析个案, 不仅首次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全貌、运作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考察, 而且还重点对“治运”如何影响华北各地民众生活、心态进行了探讨。^④ 岳谦厚、张玮所著《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⑤, 利用大量山西省档案资料及口述史料, 对晋西北的生态环境变化、抗战前后一些典型村庄的经济及社会实态以及民众生活的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梳理。

辛培林分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社会形态, 认为日本在农村仍然扶持地主阶级, 城镇各行各业迅速实行日本殖民式的“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倍受摧残。^⑥ 李淑娟论证了日伪的鸦片毒化政策对

① 李峻:《日伪统治上海实态研究(1937—1945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魏宏运:《抗战时期孤岛的社会动态》,《学术研究》1998 年第 5 期。

③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 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书海出版社 2005 年版。

⑥ 辛培林:《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东北社会形态》,《龙江社会科学》1995 年第 4 期。

东北农村的恶劣影响，破坏了农业生产的均衡发展，造成农民生活的极大困难，摧残烟农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道德和风气，使东北农村几乎成为烟毒地狱。^① 吕伟俊、宋振春考察了山东沦陷区状况后认为，山东是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之一，沦陷面积几乎覆盖全省，日军对山东的侵略和统治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分析了伪政权和伪武装力量这些汉奸组织的具体情况，揭露了日伪在山东统治的长期性和残暴性。^②

在上述整体性、区域性研究日益深化的同时，有关战时社会结构变动的专题性研究视野日益拓展，方法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不断深入。

人口流动及难民 侯杨方提出，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与医疗技术、现代交通工具由西方引入中国，并逐渐从城市向乡村、从沿海向内陆的普及和传播，中国发生了流行病转变与人口转变，即死亡率渐趋下降，从此开始摆脱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人口模式。这一转变，成为中国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③ 曹树基在所著《中国移民史》(民国时期卷)中，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现象，指出抗战时期一些城市如南京、徐州、长沙、衡阳等地人口损失严重，重庆和一些西南大后方城市人口激增，分析了战时人口西迁的特点。他在专章中指出：1945年前后，战争在太平洋地区展开，海外移民几乎停止，1945年后，人口外迁与移民回迁并盛。^④ 关于战争时期人口迁移的问题，专著不多。其中，孙艳魁

① 李淑娟：《日伪的鸦片毒化政策对东北农村社会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吕伟俊、宋振春：《山东沦陷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对战时难民群体进行了整体性分析,通过对有限资料的整理,不仅宏观描述了战时难民群体的规模、形态、流向、影响等方面,还就难民的性别和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与婚姻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并对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体系及成效进行了考察。^①

战争因素导致人口流动的非常态性,表现出了非常规的复杂性,产生了更多的研究点。夏明方在探讨抗战时期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间的关系时认为,对于人口迁移而言,灾荒比战争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抗战时期,局部地区气候等状况的恶化,再加上战争直接或间接的破坏,极大削弱了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以致于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会带来巨大灾难,其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难民迁移的过程、流徙路线及具体特点等方面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也形成了与战前人口迁移不同的特点。^②程朝云探讨了抗战初期部分地区人口因受战争影响,不得不从东部向西南、西北等战时大后方迁移的几个具体问题。认为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特点也不同。同时简要地论及了难民的职业构成。^③张根福论述了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和地区分布,指出战时浙江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而前者又为主要因素。^④他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在从战时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人口迁移的数量与分布、结构、安置与救济等角度宏观考察此一时期人口迁移概况后,又从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金融界的横向横切面探讨了战时浙江迁移群

①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体的阶层特征,并对人口迁移带来的诸如区域开发、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在与人口迁移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的考察中,此书仅涉及了民众负担加重、生态破坏、疾病流行与身体素质下降几个方面,对于流民引发的土匪、流氓、娼妓、迁移地人地矛盾加剧等问题并无涉及。^①他还以浙江省为个案分析了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从籍贯构成、年龄和性别构成、职业构成上概括了迁移人口的结构状况。^②近来,张根福的研究扩展到了战时的安徽省,他以260余万安徽难民为个案,探索了人口迁移中的复杂情况,特别重点阐述了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社会各方面的带来重要影响。^③

总之,战时有关人口研究的论著较多,学者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切入,突破了以往的视角局限,大大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但相关资料还亟需挖掘,一些具体数据有待考订。

宗族与村落 战争破坏了旧的社会结构,造成区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再加上华北区域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都极大冲击了旧有的农村宗族势力。傅建成认为,抗战时期中共对宗族政策的特点,有一个从过去的摧毁政策转为温和改良政策的改变,目的在于适应抗战的需要。^④

张佩国以山东省农村为考察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力求突破传统经济史学对生产关系静态描述的特征,从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角度,分析了地权分配在农村社会经济生

① 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② 张根福:《抗战时期迁移人口的结构分析——浙江省个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张根福:《战祸、自然灾害与难民迁移——抗战时期安徽省个案研究》,《史学档案》2004年第4期。

④ 傅建成:《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宗族政策、行为分析》,《历史教学》2001年第11期。

态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并对农家经济、村落社区等相关因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近代农村的地权分配、经营方式、村落社区与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①

二 社会组织、阶层研究引人注目

在特殊的战时背景下,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被凸现在历史舞台上,各个组织和阶层在抗战中都有或多或少、主动或被动的表现,反映出广大民众在抗战时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特征,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形态。近年来,史学界对战时中国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的研究相当重视,成果较多且引人注目。

社会团体 在近代社会中,社会团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时期,社会团体对抗战的态度及其倾向性,不仅是衡量这个团体的性质是抗日、中立还是亲日的标准,也决定着这一社会团体的生存空间、功能及其社会影响。阎振民、张红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奉天工大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和发展,指出奉天工大部分中国学生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统治、殖民教育和民族压迫的切肤之痛,在自发反抗后加入了东北抗联执委部,实现了该组织由自发反抗向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反满抗日斗争的转变。^②杨慧认为,抗战初期国统区的妇女运动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目标,以团体活动为主要特色,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占有重要一页。^③她在考察了

①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1999年版。

② 阎振民、张红:《奉天工大学生反满抗日团体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③ 杨慧:《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妇女运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0期。

抗战前期国统区妇女救亡团体后指出，在国统区广泛建立的各类妇女救亡团体，分别由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创办，数量之众、类型之多以及各阶层成员之普遍，蔚为奇观。但也有不足之处。^①

商人与商会 刘菊香指出，在外国商会影响下，广西商会借鉴外省经验而成立，主要职能虽是护商，但在抗战中也在鼓励商人投资、协助政府推行政令、开展献金工作、外争国权、兴学育才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贡献。^②周石峰、金普森分析了南京政府前十年间津沪商人罢市的特征与成因，认为津沪两地商人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一致反对罢市倡议，或囿于战时环境而被迫罢市。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罢市行为或其主动性之缺失，既可归诸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压制性政策，又与当时中共的弱势地位及相关政策密不可分。并指出有无罢市之举，主动抑或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特异性之标尺。^③张守广研究了战时大后方企业家群体的基本特征，指出其对抗战胜利和西南、西北区域经济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④魏文享阐述了战时商人团体经过国民政府的整顿与监控，被纳入到其统制体制中的经过及其影响。^⑤

郑成林在对商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行探索后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采取措施削弱商会的势力，但是商会仍未失去独立

① 杨慧：《抗战前期国统区妇女救亡团体的历史考察》，《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② 刘菊香：《广西商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③ 周石峰、金普森：《南京十年时期津沪商人罢市之特征与成因》，《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张守广：《论抗战时期后方的企业家群体》，《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⑤ 魏文享：《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性。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活动不仅超越“在商言商”的信条,与政府政策的导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上海市商会从舆论上给政府造成了巨大压力,迫使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说明商会是具有明显独立人格的商人团体。^①张福记也对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考察。^②宋美云认为,由于日本不择手段地对天津商会组织系统进行渗透,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最终充当了日本调控华北市场的得力工具。^③

上海宁波帮的抗战活动,是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救国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曹峻分析了宁波帮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关切国家民族的兴亡,具有较高的爱国热忱,反对国民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他们抵制日祸,救济难民,支援前线,构成了全民族抗战的一个部分。^④

知识分子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始终保持民族气节,积极投身抗战,在抗战文化的推进上做出过重要贡献。马嘶以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的1937年为切入点,描绘并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知识界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记述了知识分子的艰难境遇和抵御外敌的爱国情操。^⑤王金 指出,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现代科学的载体,在长期抗战的困难条件下,安贫乐道,刻苦从事科学研究,其成就泽被后世。^⑥张红对内迁西南知识分子群体开展的抗战文化进行全面梳理,突出了内迁进步知识分子保存中国文化血

① 郑成林:《“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市商会的民主抗日动向——兼谈商会与国民政府之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4期。

② 张福记:《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与商会关系》,《史林》2001年第2期。

③ 宋美云:《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④ 曹峻:《上海宁波帮的抗日救国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⑤ 马嘶:《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⑥ 王金:《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脉、开发西南的贡献，从新的视角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①

魏继昆认为，九一八事变伊始，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渐成一个具有总目标一致性、较强的理性救亡意识、特殊的抗日救亡手段、构成广泛等鲜明特点的群体，经历了局部抗战、全面抗战两个时期，形成了以胡适等为代表的右翼群体、以沈钧儒等为代表的左翼与小资产阶级混合群体和以郭沫若、鲁迅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群体等三个类型，在战时完成了启蒙民族意识、积极参政议政、影响时政、无情批判抗战营垒中的错误现象等工作。^② 魏继昆探讨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队伍发展的社会因素，重申了“汉奸知识分子”概念。指出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某些抗日政策和民主党的发展等社会因素的促成，国统区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发展。^③

江沛、张丹从史学界较少论及的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出发，从运动缘起、运动在国统区的扩展、运动背后的党团纷争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国统区青年学生群体与抗战政治的关系。^④ 朱鸿召以革命知识分子奔向延安献身抗战，参加整风，洗心革面，重塑人生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全面透视了中国革命影响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变革路程。^⑤ 刘悦清分析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历史地位，认为正是在延安时期他们接受了马列主义，初步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改变了阶级属性，确定了革命目标，为

① 张红：《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魏继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魏继昆：《论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队伍发展的社会因素》，《长白学刊》1998 年第 2 期。

④ 江沛、张丹：《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⑤ 朱鸿召：《延安文人》，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抗战做出了贡献。^①

留学生群体是知识分子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系统、全面接受了先进的科学体系与文化理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群体由当时留学海外、归国群体两部分构成,其在海外宣传中国抗战、在国内致力于支援抗战。王奇生不仅考察了留日群体的思想动态、留学欧美群体的文化救亡,对于归国留学群体在战时从事舆论宣传、受训从军、参与教育、科学与实业救国的工作,均给予了系统扎实、客观公正的考察,他还考察了伪政权治下的留学教育及其影响。^②

华侨 抗战时期海外华侨群体对于中国抗战的捐输,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华侨群体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著作较为丰富。任贵祥对华侨抗战的系列论文及专著,资料丰富,观点客观,对抗战时期华侨活动的特征总结精到,把抗战时期华侨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③黄小坚等分析了华侨群体在抗战爆发后自发兴起的救亡运动、华侨对抗战的无私援助、人力贡献、对日本的经济制裁等,对华侨群体抗战时期的动向及心态描述淋漓尽致。^④与黄小坚等人著作内容相近的同专题著作还有邱荣章的《菲律宾华侨与抗日战争》^⑤、冷燕虎、欧阳惠所著《赤子热血

① 刘悦清:《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② 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任贵祥:《华夏向心力——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海外赤子在抗日战争中的奉献》,《望》1995年第39期;《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④ 黄小坚、赵红英、丛月芬:《海外侨胞与抗日战争》,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香港荣誉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

——《环球华侨抗日行动》^①、龚陶怡所编《菲律宾华侨抗日斗争纪实》^②，都对华侨群体在抗战中的爱国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

袁素莲研究了海外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特点，认为华侨的抗日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相关联，持续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远，斗争形式多种多样。^③ 魏宏运考察了华侨的捐输与救亡运动，指出他们组成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联合各界华侨，通过捐款捐物、抵制日货、回国服务和投资等方式，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④ 日本学者菊池一隆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视角研究了华侨对战时中国的贡献。作者专门以华侨援助“工合”运动为切入点，对其目的、实态、特征及其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⑤

经盛鸿考察了南京沦陷前后 20 多位留驻南京的西方侨民对中国难民的全力援助与对日军的奋勇抗争，在这些具有人道主义献身精神与较高文化素质的西方侨民面前，日军当局对西方侨民及“南京安全区”的两面态度与两手政策只能以失败而告终。^⑥

地主、农民、工人 近代乡村的地主阶层，是一个构成复杂、变动较大、影响乡村至重的群体。因为社会变动巨大、掌握政治与经济资源的差异性，抗战前地主阶层即处于分化状态。战时地主阶层面临着中国革命、民族战争的双重压力，其变动非常重要。但史学界对战时地主阶层的生活状态关注不够，成果相对较少，一些成

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华文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袁素莲：《试论海外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特点》，《山东社会科学》1995 年第 3 期。

④ 魏宏运：《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⑤ [日] 菊池一隆：《抗日战争时期的华侨和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⑥ 经盛鸿：《南京沦陷前后的西方侨民及其对日抗争》，《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果只涉及中共各根据地的地主政策。胡穗考察了抗战前后中共有关地主富农土地政策的变迁,认为这种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变迁的原因在于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①张学强分析了战时山东省莒南县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拔地斗争,认为拔地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贫民生活,但沉重打击了初具规模的富农经营。^②王友明以中共在山东根据地莒南县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为个案,对当时针对不同情况分别采取的“拔地”、“增资”、“找工”、“借粮”、“找问题”、“开斗争会”等措施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政策使地主、富农的地权及财富逐渐向贫雇农转移,减租减息运动客观上达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③

关于战时农民阶层的研究较多。张鸿石在分析了华北各根据地农民政治参与状况后认为,各根据地农村的政权结构、社会组织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这种政治参与,对农民自身及中共的革命目标都产生了深远影响。^④徐建国论述了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认为减租减息政策减轻了封建剥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精兵简政政策与部队“大生产”运动的相结合等,又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⑤黄正林、文月琴以战期陕甘宁边区农业税为研究对象指出,抗战初

① 胡穗:《抗战爆发前后党的地主富农土地政策变迁的历史考察》,《湖湘论坛》2004年第4期。

② 张学强:《山东省莒南县的拔地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③ 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

④ 张鸿石:《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河北学刊》2002年第2期。

⑤ 徐建国:《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减轻农民负担历史考察》,《阴山学刊》2004年第5期。

期, 边区向农民征收农业受益税的内容, 主要是征收救国公粮, 这是边区农民的一项主要负担。1941年前, 一些基层干部为超额完成公粮任务, 侵害了部分农民的利益, 使农民对交纳救国公粮一度产生了抵触情绪。1941年后, 边区进行调整并革除弊端。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 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没有在边区完全推行开来。^① 郑立柱指出, 八年抗战期间, 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相对减轻, 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坚持正确的负担原则, 逐步完善负担政策, 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增收节支, 成功解决了农民负担问题,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保障了战时财政。^② 秦兴洪、廖树芳认为, 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 80% 以上, 抗日战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战中, 农民表现出了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各族农民广泛参与、以弱胜强的智慧和创造力等特点。^③ 李金铮对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提出了新的见解, 认为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民间借贷政策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 同时也由于惯性力量的约束, 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体现了革命策略与承继传统的内在矛盾和困难选择。^④

王士花分析了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状况, 指出日军的侵略及统治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使华北区域各地粮食的播种面积、产量、流通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受到了极大影响, 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只能改变, 铁路、公路及传统的牲畜运输量

① 黄正林、文月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郑立柱:《晋察冀边区农民负担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秦兴洪、廖树芳:《论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农民》,《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④ 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的增加,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伪交通统制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所在。^①李淑娟从集团部落的个案,考察了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生活的悲惨境地,认为正是日伪统治导致了东北农村社会危机达到了空前的程度。^②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一书,系统、全面讲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全过程。其中专设一章论述了抗战时期工人运动的状况。^③郭洪茂论述了东北沦陷时期满铁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一方面,满铁的中国工人在生存不断恶化情况下肩负着沉重的运输劳务;另一方面,却因生活日艰使本已脆弱的劳动能力无法再生,从而造成铁路运输陷入恶性循环。^④解学诗在分析了“特殊工人”的若干问题后指出,强制役使华北“特殊工人”,是伪满后期四种强制劳动形态中最为残酷的一种,“特殊工人”实际上是丧失一切自由、随时可遭杀戮的战争奴隶。^⑤

汉奸群体 战时,日本先后在中国各地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伪政府”等伪政权,各地方的基层汉奸政权也很多,不仅形成了为非作歹、为害乡里的地方汉奸、伪军,一批曾留学海外、具有高等教育背景、拥有官职者,也在战时成为汉奸群体的构成部分。南京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审讯汪伪汉奸笔录》一书,收入了战后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对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温宗尧、江亢虎、陈璧君、梅思平、林柏生、李圣五、丁默村、陈春圃、罗君强、王荫泰、殷汝耕、周作人等 22 位影响较大汉奸的审

① 王士花:《华北沦陷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史学月刊》2006 年第 11 期。

② 李淑娟:《从集团部落看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

③ 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郭洪茂:《东北沦陷时期的满铁铁路中国工人状况》,《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1 期。

⑤ 解学诗:《关于“特殊工人”》,《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判记录^①，对于认识汉奸群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有关汉奸群体的研究逐步兴起，张生等人以华中地区日伪关系为题切入，对汉奸群体进行了初步的探讨。^②潘敏分析了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认为这一群体的人员成分在清乡前后有较大的变化。^③

三 社会生活研究正在兴起

从目前的成果而言，有关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是战时社会史领域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之一，需要挖掘的内容太多，需要探讨的课题也十分广泛。

婚姻与女性 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相对的稳定性。在抗战的特殊情景下，一些区域的婚姻状态发生了某些变化。

傅建成认为，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婚姻恶习的改造，在华北各根据地颁布了一系列的新婚姻法规，以保护妇女权益、输入新的婚姻及家庭观念，从而破坏了旧婚姻制度的根基。除去陋习，解放妇女，改变旧的婚姻与家庭结构，成为各根据地区域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④李晓晨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一些婚姻改革的个案研究后认为，各根据地新政权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是根据地区域婚姻改革的前提，文化建设对婚姻改革起

① 南京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张生等：《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潘敏：《江苏日伪县知事县长群体分析》，《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④ 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着直接作用。她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政策的不成熟之处。^① 崔兰萍认为, 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的最大特色, 是新式婚姻方式的兴起^②, 她还论述了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反家庭暴力运动, 认为这一运动有助于改善传统家庭的家长制风气。^③ 秦燕也对战时陕甘宁边区改革婚姻家庭的制度及具体做法进行了考察, 认为在婚姻变革中出现的法律与习俗、两性关系、新旧婚姻观念间的冲突, 表明了战时农村社会从传统向现实变革过程中的矛盾, 也揭示出婚姻及家庭变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④

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 妇女解放凸现出的是妇女作为不可或缺的民族力量的重要作用。从民族战争组成部分的视角进入, 丁卫平论证了战时妇女抗日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步发展, 认为民族解放运动也加速了妇女解放的进程。^⑤ 刘萍以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为考察点, 指出妇女纺织运动不仅对于各根据地顺利渡荒功不可没, 也大大推进了各根据地的妇女运动。^⑥ 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认为, 太行山根据地的妇女参与革命的情况比较复杂, 有些地区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有些地方仍然强调男性权威, 有些地方的妇女却被利用以对抗中共政权, 情况不一。^⑦ 黄正林在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后指出, 在边区妇女政策的推动下,

① 李晓晨:《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婚姻风俗改革》, 郭德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崔兰萍:《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改革探析》,《西北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③ 崔兰萍:《抗战时期反家庭暴力在陕甘宁》,《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④ 秦燕:《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婚姻家庭变革》,《抗日战争研究》2004 年第 3 期。

⑤ 丁卫平:《中国妇女抗战史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⑥ 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⑦ [澳]古德曼:《革命中的妇女和妇女在革命中——抗日战争中的妇女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 3 卷, 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巨变，政治上有了参与权，经济上有了生产自主权，婚姻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高。^① 曲晓鹏对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权益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令和法规，使边区妇女获得了空前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婚姻权利，在晋察冀妇女解放运动史和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② 何黎萍指出，中共在苏区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将妇女教育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妇女教育形成了鲜明的革命性、平民性、实用性和多样性特征。^③

风俗变迁 社会风俗的变化，也是社会变动的重要反映。魏宏运在分析了中共领导下的太行山新文化运动后指出，经过在农民中开展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和冬学运动，使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内容的新文化得以广泛传播，而传统的伦理观念和迷信风俗受到挑战，促进了山区的发展。^④ 黄正林研究了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认为主要表现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废除缠足陋习，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流子改造及禁毒等方面，认为这次社会风气的变革比较全面。^⑤ 魏宏运对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进行了分析，认为抗战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期间，因中共的存在

①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曲晓鹏：《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妇女权益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③ 何黎萍：《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妇女教育特征考察》，《安徽史学》2006年第3期。

④ 魏宏运：《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新文化运动》，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风气的变革》，王先明主编：《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利结构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对以前的一些风俗和陋习有所改变,摆脱了传统信仰和旧道德的束缚,体现出了时代精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①

张丹认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工作,在战时的条件下也在摸索发展中。^②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分布不平衡的问题,黄正林探讨了边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把分散的个体劳动组织起来,使其由个体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二是通过移民政策,把地少人多地区的过剩农业劳动力迁移到人少地多的地区,把由国统区和沦陷区流动到边区的难民安置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区。^③李云峰、刘俊凤分析了1931—1945年间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战略构想的实施,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因之得到改善,民众的社会生活如衣食住行、婚姻家庭、文化休闲等各个方面都随之发生了相应变化。这种变迁既带有计划变迁等特点,也颇具近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时代进步性和复杂性。^④黄正林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考察了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政治动员的关系,指出民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逐渐脱离了旧权威的势力范围,这也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主要控制。^⑤

抗战时期医疗卫生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刘轶强以太行山根

① 魏宏运:《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广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② 张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1期。

③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④ 李云峰、刘俊凤:《抗日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的变迁》,《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⑤ 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根据地医疗卫生领域变革为线索,以根据地医疗卫生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战争和革命背景下医疗卫生体系的演变,指出中共建立的医疗卫生体系是“生产支前”工作的重要保证和根据地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取得了显著的成就。^①

四 社会问题研究大有进展

抗日战争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动荡,本来就虚弱的基层行政权力因不少地区沦为战区而化为乌有,也在不少非战区陷于瘫痪,各种替代性社会组织应运而生,旧有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一些新的社会问题由此发生。

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基于政权动荡、经济衰落、管理失序的社会背景,其组织形态、运作方式又是民间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战争造成了区域性的社会动乱,成为秘密社会快速发展的温床。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秘密社会组织,在抗战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有积极抗日的,有被中共改造后成为根据地的有益力量的,有被日伪军利用成为侵华工具的。认清这一时期秘密社会的状态,理清其发展脉络,对于深化抗战时期社会史研究极有意义。

梁家贵对抗战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的特性以及国民党、中共及日伪政权三大政治势力对于秘密社会的政策作了深层次的分析。^②谭松林主编、陆仲伟和邵雍分别撰写的《中国秘密社会》第5

① 刘轶强:《革命与医疗——太行山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史林》2006年第3期。

② 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秘密社会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卷“民国会道门”和第 6 卷“民国帮会”^①、路遥著《山东民间秘密教门》^②、郭绪印著《清帮秘史》^③、俞乃章著《抗日战争时期澄西地区的大刀会》^④等专著,对抗战时期的教门、帮会的发展都有所涉及或研究。日本学者三谷孝所著《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⑤,对抗战前后华北天门会、红枪会等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及在三大势力争斗中的命运,有较为清晰的分析,对中共对于秘密结社组织的政策及实效,都有精到的考察。

乔培华对抗战前后活跃于豫北、晋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枪会组织——天门会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天门会产生的复杂背景、其组织形态、信仰特征、活动规律,对其与冯玉祥、张学良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她认为,天门会之兴,得益于地方政权失控、经济动荡的社会背景,其亡则正是抗战时期中共、国民党及日伪政权对其的极力争夺。^⑥日本学者三谷孝也论述了天门会与中共的关系,指出中共在争取天门会参加抗日的工作是成功的。^⑦日本学者马场毅在研究了山东省红枪会后指出,红枪会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乡土保卫主义,并不是抗日民族主义。在争取红枪会的过程中,中共的政策是失误的。^⑧三谷孝也认为,战时的红枪会虽受到多方面势力的争取,但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始终保持着乡土保卫主义的传

①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⑥ 乔培华:《天门会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⑦ [日]三谷孝:《豫北天门会与中国共产党》,江沛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6 年版。

⑧ [日]马场毅:《山东抗日根据地与红枪会》,蔡少卿主编:《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统。^①张桂华研究了冀鲁豫根据地区域会道门组织的演变,指出在全民族抗战影响和中共政策引导下,一些会道门组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与分化。^②梁家贵从相反的角度探讨了抗战时期日军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组织的政策及其危害。^③郭晓平对这一时期冀鲁豫交界区枪会的兴亡、枪会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各种政治势力与枪会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论述。^④周建群考察了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指出华中新四军不仅提出和制定了正确的争取、利用和改造帮会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政策,争取了帮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使其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员。^⑤

邵雍论述了日本势力利用中国帮会破坏抗战的情况,分析了日本控制汉奸帮会的手段、途径,以及汉奸帮会在日本侵略中的作用。^⑥

民族与宗教 在傅波主编的书中,汇集了抚顺地区少数民族抗日战争研究论文近30篇,从不同角度揭露了日军侵华暴行和辽东地区少数民族英勇抗战的事迹。^⑦胡云生对回族的抗日救亡活

① [日]三谷孝:《抗日战争中的红枪会》,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张桂华:《会道门组织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演变述略》,《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③ 梁家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利用操纵山东会道门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3期。

④ 郭晓平:《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枪会》,《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⑤ 周建群:《新四军争取帮会抗日的方针与实践》,《安徽史学》2006年第5期。

⑥ 邵雍:《日本侵略者利用中国帮会破坏抗战述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⑦ 傅波主编:《辽东地区民族抗战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动作了概述,分析了回族抗日活动的各种形式,特别指出回族人通过信仰伊斯兰教的同一性进行抗日爱国外交活动的特点。^①

韩国学者尹辉铎分析了伪满洲国的民族结构,揭示了伪满洲国时期劳动界各民族间的工资差异,劳动条件的差异及民族间粮食供给顺序,认为伪满洲国的劳动政策是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主,朝鲜人在其劳动政策中处于次要的地位。^②

喜饶尼玛研究了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指出藏传佛教僧人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与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积极投身于抗日活动,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增强了民族凝聚力。^③ 1930年代后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西部民族地区以巩固抗战后方的运动,号召教会内外有为之士,到当时被称为“边疆”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计、教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服务工作。杨天宏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边疆服务运动的历史,对于认识基督教传教活动在近代中国经历的变化,提供了以往研究忽略了的重要例证。^④

土匪与毒品 近代以来的政治动荡,导致一些地区的土匪活动日益猖獗,成为危害社会的一大顽疾。赵文认为,战时陕甘宁边区土匪群体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边区为彻底消除匪患,认真分析并把握土匪的独特活动规律,采取综合的手段,标本兼治,取得了边区清匪斗争的胜利。^⑤ 祁健民分析了晋北、察南抗日根据地对付匪、联庄会的

① 胡云生:《我国回族抗日救亡活动概述》,《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韩]尹辉铎:《伪满洲国劳动界的民族结构和民族间的位置关系》,《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④ 杨天宏:《战争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基督教会》,《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 赵文:《试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土匪问题》,《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收编改造工作，认为收编工作取得了胜利，但其中也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①

齐霁认为，日本战时的毒化政策导致沦陷区毒品泛滥，也波及到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区域。各根据地为此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禁毒法规。这些法规比较完整、系统，内容涉及禁种、禁贩、禁售、禁吸等方面，其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意义。^②

灾害与救济 抗战时期，战祸灾荒不断，严重影响着社会的正常运转。徐有礼、朱兰兰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研究了花园口决堤带来的灾难，指出这次决堤造成黄河历史上第一次人为改道，黄河在夺淮入海途中，挟带巨量泥沙肆意漫决，形成了大范围的黄泛区，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给泛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③ 这一研究首次涉及抗战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角度新颖，引人注目。魏宏运分析了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④ 孙艳魁从国民政府组织难民参加垦荒、进行生产自救等方面切入，探讨了这一政策的成就和意义。^⑤

吴丽华、邢丽雅分析了人口西迁大潮中，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

① 祁健民：《晋北察南抗日根据地对土匪、联庄的收编改造工作》，南开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齐霁：《抗日根据地禁毒立法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③ 徐有礼、朱兰兰：《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⑤ 孙艳魁：《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

的安置措施,客观上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后方。^①王春英则对抗战时期的难民收容所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产生、存在与抗战进程相始终,虽具临时性、被动性,但其形式简捷灵活、数多量广,其社会有效性不可忽视。^②1939年是晋察冀边区的大灾之年,洪水肆虐,晋察冀边区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惨遭损毁。李金铮阐述了边区政府采取的种种救荒措施及其实施,对于救灾渡荒的良好效果进行了分析。^③高冬梅分析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救灾工作,认为各地政府首先把救灾工作当作施政的重要内容,加强救灾制度建设,同时充分调动政府、社会、个人诸方面的力量,一方面采取发放款项、衣物以解灾民燃眉之急,另一方面采取积极救灾措施以提高防灾抗灾能力。这些措施有效遏制了灾荒的蔓延。^④潘国旗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公债进行了评述,指出各抗日根据地为赈灾救灾和经济建设而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基本特点,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⑤

陆和健考察了战时西部农垦事业的优劣,指出国民政府在战时开始注重西部垦务,颁布垦荒政策和法令,以国营、省营、民营、屯垦四种形式次第展开,起到了救济难民、稳定社会、增加后方粮食供应、促进西部开发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实际操作中的诸多缺陷和弊端。^⑥温金童、李飞龙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的卫生防疫方针政策及其效果,认为边区在大力进行卫生宣传和

① 吴丽华、邢丽雅:《抗战初期人口西迁大潮及国民政府的安置措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②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③ 李金铮:《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

④ 高冬梅:《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⑤ 潘国旗:《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陆和健:《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史论》2005年第2期。

建立一系列卫生组织的同时，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逐渐下降。^①

五 心态史研究悄然崛起

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崭新视角，心态史的研究涉及诸个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资料的运用要求严格而细致，抗战特殊时期的心态史，是一个复杂的研究领域，它不仅直接支配了当时人们的行为，也折射出当时的战争背景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个状态。目前成果较少，但发展前景令人关注。

抗日战争时期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极特殊、关键和重要的时期。一方面，日本的全面武装侵略、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被迫中断；另一方面，20 世纪以来逐渐觉醒日益澎湃的中国民族意识、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和思想潮流，在抗击外来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王桧林论证了抗战时期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即新思维的出现，指出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看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对世界将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信念和责任感，对今天处理国际事务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②

张连红分析了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民的心理状态，认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在心理上有一定程度的准备，采取向内地迁移，将女儿提前出嫁、避难安全区等行动；政府与社会团体虽也做

① 温金童、李飞龙：《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抗日战争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② 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5 年第 9 期。

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民众工作,但由于对日军残暴性认识不足,导致政策的失误。^①他还从南京沦陷前市民的恐慌心理状态入手,探讨了南京沦陷后市民的惊惶失措,纷纷寻求自保,涌入西方人开设的安全区;在死亡面前,难民几乎失去理智,麻木对待死亡,人性被扭曲;渴求保护的脆弱心理寄托着对国民政府和西方人的微妙希望;屠杀也破坏了南京的社会家庭结构,造成“不完全”家庭的比例增多。^②李惠康把沦陷区民众的社会心理总结为:不畏强暴的斗争性、被迫统治的奴性和麻木不仁的惰性。^③

抗战时期,大批内迁进步文化人士的民众意识得到了显著增强。张红认为内迁进步文人突破了过去狭窄的知识分子圈子,逐步深入到民众中去,接触和体验民众的现实生活,表现出较强的民众意识。^④

魏宏运分析了抗战时期华北农民的民族觉悟与抗战意识问题^⑤,朱德新探讨了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影响下,农民已经有了政治参与的群体意识。这种意识的主流是建设性的,但也存在破坏性参与,易导致无政府行为。^⑥

王明钦、杨冰洁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共宣传的正确心理导向、巨

①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之前南京市的社会心理》,《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社会心理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③ 李惠康:《论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的社会心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1期(2005年)。

④ 张红:《抗战时期内迁进步文化人士的民众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0卷第3期(2004年)。

⑤ 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⑥ 朱德新:《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历史教学》1994年第4期;朱德新:《论抗战时期的冀东农民》,《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大的心理激励、积极的心理控制和牢固的心理凝聚等四个方面的功能,认为这是中共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团结抗战的成功所在。^①黎志辉考察了蒋经国“赣南新政”的社会动员效果,认为这次动员民众的思想,既有国民党动员政策的脉络可寻,也受到苏联模式的感染。社会动员是一个荡涤旧俗、裂变旧的社会心理信条的过程,赣南社会由此经受了苏区革命以来新一轮的洗礼。^②

李金铮区别于以往学者多从“政策——效果”模式考察土改政策社会效果的思路,以华北乡村土改时期“农民心态”为研究对象,进入了历史心理学的层面。文中涉及五种心态,即不敢斗争的怯懦心态、被剥削感与阶级意识的孕育与增强、将地主打翻在地的复仇心态、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和惧怕冒进、富裕的心态。作者把中共各个时期不同的土地政策贯穿其中,论证了这五种心态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后四种农民心态的演变,都与中共的政策息息相关。^③

六 特点、问题及其展望

著名社会史学者冯尔康先生指出:“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

① 王明钦、杨冰洁:《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宣传的社会心理功能》,《史学月刊》1995年第6期。

② 黎志辉:《蒋经国“赣南新政”时期的社会动员》,《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③ 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① 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个范畴。

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有关抗战时期社会史的研究,水平有很大提高,成果较为丰硕、涉及内容日益广泛、研究视角日益开阔、方法更加综合化,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在具体的一些领域内,研究成果较少,还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基本特点: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抗战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动是非常态的,是考察战时中国社会实态及变革时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包涵的内容来看,各个层面都有数量不少的研究,在目前宏观研究不甚兴盛的研究风气下,区域性社会变动的研究既观照具体区域的变动特性,也成为考察战时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基础。近年来,有关社会组织及阶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团体、商会、知识群体上,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心态史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方面来说,总体上还是比较薄弱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已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新兴的领域,并有一部分学者开始了开拓性的探索。

若干问题:战时社会史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资料的发掘及利用刚刚开始,各个领域的研究缺少关联性。此外,有关社会史理论的总结及应用还不成熟,导致具体的研究缺少学术的规范性。特别是不少相关研究由于缺少社会史理论的运用,只有具体的甚至是琐碎的描述,没有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与具体事物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对于战时社会影响至深且巨的民族主义思潮缺少理解,不能客观地阐述抗战初期中华民族意识尚未形成的事实,对于

①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国统区的社会变革研究薄弱,对于中共领导的各根据地区域社会变革的本质性有夸大的倾向,没有针对性地寻找战时社会变革的根本路径。对于日伪占领区社会实态的研究,也缺少具体而客观的评价。战时社会问题的研究,多与抗战联系起来分析,这一研究视角看到了战争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具有关联性。机械地思维方式使战时社会史的研究呈现出单一线条的发展模式及被动形态,社会本身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研究趋势:抗日战争在各个区域的规模、特点、影响不一,过去宏观展示整个抗日战争与历史变动的研究方法,将可能逐步被区域性社会史研究所取代,这是抗战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战时社会史研究深化的必然反映。其次,如何将对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思潮及现代化理念及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变动的关联性有机结合起来,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学术增长点。其三,由于社会史研究理论运用的问题,社会史研究的继续细化将不可避免,其利弊得失现在还很难看清。其四,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战时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形态是深入考察这一领域的重要手段。作为抗战社会史的细化要求、社会与思潮互动的感受,有关社会生活及社会问题的研究,将持续展开并形成热点。其五,抗战社会史研究的日益深化,必然更加注重对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其六,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入历史学研究并形成共识。口述资料的获取及相关口述史的研究,不但可以弥补档案文献的不足,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记忆。作为抗战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口述战时社会史既有条件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江沛,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迟晓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仲明)